

不选择米开朗基罗，不选择罗丹，这不是落后，这是文化的选择。然而，如果情况真是这样，我们按照米开朗基罗、罗丹的逻辑培养出来的雕塑家们，面对中国最广大的人群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有人说，我们过去不是有过大量歌颂工农兵的艺术吗？我以为那些艺术不是对农民的歌颂，而是对农民的强暴。农民和农村不仅仅是一个题材的问题，艺术作为文化权利，它和农民的关系，体现的是社会的道义和良心，公平和正义。而在中国，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，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，关注他们喜怒哀乐，这样的艺术一直付之阙如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罗中立的《父亲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，可惜的是，仅仅只有一个良好的开头，这种探索并没有能继续下去。令人欣喜的是，二十年后，在二〇〇〇年，中央美术学院的年轻毕业生梁硕以他的《城市农民》的雕塑，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，成为近两年来雕塑界的一个经常被提起的作品，可见，尽管这样的探索属于凤毛麟角，但它牵动着社会敏感的神经。

看来，中国当代艺术仅有文化的转型是不够的，中国当代艺术只有在强调公共性的基础上，完成社会学的转型，让它成为大多数人的艺术，才会真正有自己的未来。

短长书

慧思和虚云的自撰年谱

高山杉

思大难不死，转而南下传法。在南方弘法时，慧思曾发愿造金字《般若经》。金经造成后，为了记下自己曲折的求法因缘，慧思取他一生主要事迹，依年编列，写过一篇《立誓愿文》。在这篇文章里，慧思发下坚定的誓愿，愿度尽世间众生，到世界终了时，自己能够亲见未来佛弥勒。这篇

佛教天台宗三祖南岳
慧思禅师（公元五一五
——五七七）年轻时师事
慧文禅师，读诵经典，修习
禅观，悟得“法华三昧”。此
后，慧思游行各州，开讲禅
法，徒众渐多。有恶僧心怀
嫉恨，投毒陷害他。好在慧

《立誓愿文》既有出世求仙、服食延寿的道家思想,又有对自己一生所历年月、地理的精确记录,把中国人隐逸和务实兼具、玄谈和史学皆重的复杂精神表现得很彻底。所以,史学家陈寅恪称赞《立誓愿文》“不独研求中古思想史者,应视为重要资料,实亦古人自著年谱最早者之一”。

陈寅恪研究《立誓愿文》,大概是在一九三二年。那一年,他开了“中国中古哲学”和“晋至唐文化史”两门课。慧思的《立誓愿文》正好属于他讲授的范围。这篇文章与我国古代哲学和宗教都有深切关系,大凡研习哲学史或佛教史的人,都知道这一点。但是,发现它是古人最早自撰年谱之一,并点出它在史学著作史上的价值,却是陈寅恪的创见。拘泥于佛典注疏章句之学的僧徒,乃至一般的史学家,恐怕很难有这样高明的见解。陈寅恪的研究所得,就是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里所收的《南岳大师〈立誓愿文〉跋》。另外,陈寅恪研究慧思的札记,现在还有一部分保存着。有兴趣的读者,可以去翻北京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《陈寅恪集·读书札记三集》,218—220页。

慧思的《立誓愿文》,曾有人怀疑不是他本人的作品。陈寅恪读后,找到一些证据,提出了不同看法。据唐代道宣法师所著《续高僧传·慧思传》说,慧思在北朝齐后主武平之初(武平元年为公元五七〇年),“背此嵩阳,领徒南逝,高骛前贤,以希栖隐”。慧思率徒南下后,“初至光州,值梁孝元倾覆国乱,前路梗塞,权止大苏山”。但是,南北朝正史记载,南朝梁孝元帝的倾覆,在梁承圣三年,也就是公元五五四年,比慧思南下出发要早十五年。五七〇年左右出发南下的慧思,怎能在光州碰上已经在五五四年发生过的梁孝元帝倾国之乱呢?因此,陈寅恪断定,道宣的记载必有讹舛。在慧思的时代,南朝、北朝并立,把南朝和北朝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纪年理清,本来就不容易。道宣在年代上犯错,也不奇怪。

再看一看《立誓愿文》的记载。慧思说,他到达光州时,正好四十岁。依《立誓愿文》里其他纪年推算,慧思应生于魏宣武帝延昌四年(北朝的纪年),也就是公元五一五年。把慧思的生年和他到达光州时的年龄(四十岁)相加,我们能够计算出,他到达光州之年正好是公元五五四年。换言之,就是梁孝元帝亡国之年——承圣三年(南朝的纪年)。因此,他遇上同年发生的梁孝元帝覆国之乱,就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由此可见,《立誓愿文》里提到的年代,与南北朝正史所记年代完全吻合。这样一来,《立誓愿文》里所记年代,就足以纠正《续高僧传·慧思传》中的年代错误。因此,陈寅恪说:“可知南北朝并立,其年号岁月后先交互之间,虽以道宣之博学,尤不能无误,而此《立誓愿文》之记载,其正确如是,则非后世僧徒所能伪造,固无疑也。”此外,陈寅恪还从《立誓愿文》里举出地理上的一个证据,与上面所引年代的例子一样,证明慧思若非当时亲履其地、亲接其事,断不能作出如此正确的、完全符合南北朝正史记载的记述。因此,陈寅恪断言,《立誓愿文》绝非他人所能伪托,当是出于慧思的亲笔。

慧思之后,写过自撰年谱的僧人还有不少,其中比较有名的,有近代的虚云禅师(一八四〇——一九五九)。虚云所作名为《虚云和尚自述年谱》。虚云是一位禅宗大德,一生云游四方,到处建寺立庙。据说,他坚持苦行,禅功深彻,凡众难测。虚云活了近一百二十岁,历经三朝更替,可说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的见证人。因读他的《自述年谱》而皈依佛门者,恐怕不在少数。但一般受过现代教育的人,却发现他记述的生平事迹中,有一些不可信的东西。南北朝时代的人读慧思的《立誓愿文》,见他讲炼丹延寿、百毒不死等事,也许不会生疑。但是,在“科学昌明”的现代,如果听虚云一本正经地说,他生下来是一个肉团,一个卖药翁剖开肉团才把他取出,大家大概不会荒唐到立即相信吧。《自述年谱》中所记令人犯疑的事还有很多,这些事都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想法,就是虚云是不是在信口胡编。因此,人们难免进一步要再问一下,以这种编神魔小说式的态度写出的东西,在基本史料上是否会有弄虚作假的地方?

作出这种怀疑的人里,有史学家胡适。胡适是近代禅宗史研究的开创者,在搜集禅宗史料的过程中,他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看法,就是古代禅宗和尚惯于伪造史料。虚云这个说话夸张的现代禅宗和尚,自然会引起胡适的注意。胡适晚年花费很大精力,写了《一勘〈虚云和尚年谱〉》、《二勘〈虚云和尚年谱〉》、《三勘〈虚云和尚年谱〉》等文章和书信,专门讨论虚云《自述年谱》中的史料问题。这段故事很有名,有许多文章做过讨论。对胡适研究虚云《自述年谱》的这份热情,他的朋友胡建中还专门写诗逗他:

你静悄悄地躲在南港，
不知这几天是何模样。
莫非还在东找西翻，

为了那个一百二十岁的和尚？

胡建中的这首诗叫《南港，午夜不能成寐，有怀胡适之先生》，当时是用笔名“康华”发表的。这首诗下面还有好几段，我只引了开头几句。胡适本人很喜欢这首诗。

胡适把虚云对他家史的记述，与有关地方志对照，发现许多地方与清代史实不符。且举一例，以示方隅。虚云的父亲，叫萧玉堂。据虚云说，萧玉堂在道光戊戌、己亥间（即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），任永春州的知府。永春在福建省。胡适查阅《福建通志》第一百八十卷，发现道光十六年任永春知府的是一个名叫沈汝翰的人，而在他之后的知府是谁，《福建通志》里却未提及。胡适再查民国十六年编修的《永春县志》，发现紧接着沈汝翰之后“署”、“任”永春知府的分别是张锡纯和章复旦两人。翻看《辞源》，“署”是代理的意思，“任”则是正式任职。张锡纯在道光十九年“署”永春知府，章复旦在道光十九年“任”永春知府。在他们二人与沈汝翰之间，也就是从道光十六年到十九年之间，根本不见萧玉堂的影子。虚云还说，萧玉堂在道光二十年“擢泉州府知府”。但是，胡适再查《福建通志》，发现道光二十年任泉州府知府的是黄德峻，萧玉堂任职一事遂不攻自破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虚云的叙述与官书记载严重不符。除了上面举的例子外，在《虚云和尚自述年谱》中，年代不符以及与晚清官制冲突之处尚有若干条。这些证据，胡适在自己的文章中都一一列出，我就不再引用了。

虚云大概从友人或学生处辗转听到胡适的批评，因此对第一版《自述年谱》中的某些错误，在出第二版和第三版时曾经做过一些订正。但是，胡适对虚云《自述年谱》以后各版的改动都有连续的批评考证。在胡适看来，不论虚云怎样改来改去，还是有问题。最后，虚云也感到无法自圆其说，变得极为狼狈，索性抛出“人生如梦，一切皆幻，空中飞鸟有何踪迹可寻，况学道人耶”一类话为自己解围。“人生如梦”也许是对的，但是梦中也脱不开“时”和“处”的纠缠。否则的话，“学道人”又何必劳心费

神按年月和地理编一部《自述年谱》呢？但是，《自述年谱》里的错误记载，到底是虚云记忆有误，还是他有意造伪，我们现在也无处去查问了。

慧思与虚云，一古一今，同以名僧身份，从事自撰年谱的编写。慧思的自撰年谱，据实而书，反遭人怀疑不是他的真作。慧思已死，无法为自己辩护。幸有陈寅恪用精密的方法，证明慧思的自撰年谱，包含着真史料。虚云的自撰年谱，虽然没有人怀疑不是他写的，但是，他叙事不清，与史实冲突，生前虽大事修改，死后还是难逃胡适连番勘问。虚云倒霉，遇上喜欢辨伪的胡适之。慧思很幸运，碰上体贴古人的陈寅恪。这两位名僧和他们的自撰年谱，在不同史学家的手里，竟有这样不同的遭遇。这件事情，在我国学术史上，也算是很奇特的了。

短长书

摄影师眼中的移民母亲

蔡 昉

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一天，多萝希娅·兰琪正在加州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，突然，一个写着“摘豆营地”的字牌映入她的眼帘。由于知道这一年的豌豆因霜冻而绝收，所以她思想斗争了大约二十

英里的路程，才终于掉转车头，经过一段泥泞的小路来到摘豆民工居住的营地。在那里，她见到一位带着一大群孩子的移民母亲，并为她拍了照片。这位三十二岁的母亲告诉兰琪，他们这些外来民工的生活已经到了危急的境况。她的家人一直依靠地里冻烂的蔬菜和孩子们用弹弓打落的小鸟果腹，并且刚刚卖掉了汽车的轮胎以换取食物。

回到家里，兰琪急急忙忙把胶卷冲洗出来，没有等到照片干透，就跑去见《旧金山新闻》的编辑。兰琪告诉编辑，加州利珀莫的移民们正在慢慢地因饥谨而死去。报纸发布这个悲惨故事的时候，配发了兰琪的照片。照片上是那位愁云满面的移民母亲和她的三个女儿，深深地陷入了对生活的绝望，读者无不为之动容。联邦政府也由此了解到移民